

<<天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808180

10位ISBN编号：7510808189

出版时间：2011-1-10

出版时间：九州出版社

作者：韩毓海

页数：354

字数：3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1945年7月，访问延安的黄炎培，曾经向毛泽东提出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见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淳焉’，‘其亡也忽焉’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”“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。

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略略了解的了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”据黄炎培的回忆，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“新路”的回答，似乎异常地简略：这便是“民主”。而上述著名的问答，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，却并未见诸于毛泽东的文稿。

今天，鉴于“民主”非常的普适、永远地正确，而又绝对的抽象，时贤纷纷然以“黄金周期率”相标榜，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，浇自己“胸中之块垒”，但也恰恰表明：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这著名的回忆，从此之后，所谓“民主”，便成为跳出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万金油，成为“普天下最好的东西”，似乎只要一朝“民主”，从此后便天下太平，万事大吉了。

其实，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对上述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问题，做了极其著名的解释和回答，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讲话：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，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，而所谓“不满”者，也就是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，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方才会埋头苦干、奋斗不息；同理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之所以会停滞不前、“政怠宦成”、乃至“人亡政息”，那就是由于它骄傲自满，如此，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武器，从而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、埋头苦干的意志：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

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。

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，保持优良作风。

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。

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

“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，这句毛主席语录，我以为比一切民主教条都更为具体，比一切“普适价值”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，它直指人心的深处，简明扼要地回应了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这个问题。

“不满”是一国、一族、一人、一家前进的动力，而“自大”则是其堕落的开始，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：由于中国开化最早，号称文明天下第一，自满、自负、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，而所谓的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，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、乃至犯上作乱了。

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：“人类所抱的‘不满之感’，显著地表现于三个方面：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、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；其次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；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而感到的不满之感”。

他的言下之意是说：夷狄、年轻人和穷人(无产阶级)，乃是人间“不满”的三大源泉，因此，他们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。

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：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社会，德行以“忠孝”为先，而儒家学说的厉害，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年轻人“不满”的资格。

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，以至于1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无产阶级的时候，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%。

何况阶级、阶层一经长期固定，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，所谓“不满”亦无法泄露，比如今日之中国，所谓“仇富”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罪，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。

如此一来，上述“三大动力”中，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，或者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“不满之感”了。

自周代起，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，便按照方向，以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(当

然，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）。

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“不满”——即进行“自我批评”，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，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，而希望文明化。

而更为重要的却是：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、与之往来角逐之际，夷狄们亦善于分析、观察、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，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、华而不实、倚强凌弱、好说不练（即今人所谓“谁打我便骂谁”的嘴硬）等深刻缺陷——而这恰恰是“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”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，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到的事实。

当着夷狄进入华夏、成为华夏的一部分，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，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、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，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，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那便会兴旺发达，推陈出新；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、大傻瓜和跳梁小丑，是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那就不免要陷入“求荣取辱”、“政怠宦成”，乃至“人亡政息”的循环。

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。

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、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、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，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。

墨法学说，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、变法思想的源泉。

墨法两家，成于魏、流于楚，墨翟、孟胜、卫鞅、韩非这些人之所以艰．辛辗转，四处碰壁，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“魏康楚富，齐淫吴巧”，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，文明积习太深，听不进批评意见，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，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“艰苦奋斗”（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）这一条，在文明发达的地区，非但难行，而且难听（极不悦耳）；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：“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毅，使人忧，使人悲，其行难为也，……墨子虽独任，奈天下何！”

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，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“戎狄”的秦。

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，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、贵族世家集团，因此，墨法“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”，“有为则上，无能则下”的平等政治主张，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。

正因为贵族、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，正因为“不党父兄，不偏富贵，不嬖颜色”乃是秦的民风，以至“王亦不爱其家”，故“上同而下不周比”、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”的户籍一连坐制度，亦方才能够秦地顺利推进；而更为重要的是：正因为秦开化最迟，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，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、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，故商鞅那一套以“农战”立国的思想，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。

墨家子弟自魏赴楚，又去楚入秦，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，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，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、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，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，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、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——于是，开化最迟、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，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。

这便是秦入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，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。

商鞅在《商君书·农战》中，曾这样比较“境外”的秦地，与“境内”的中原文明说：国去言，则民朴；民朴，则不淫。

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，则作壹；作壹，则民不偷营；民不偷营，则多利；多利，则国强。

今境内之民皆曰：“农战可避，而官爵可得也。”

是故豪杰皆可变业，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，上可以得显，下可以求官爵；要靡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

具备，国之危也。

民以此为教者，其国必削。

这就是说：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，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，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，正因为文明发达，方才重用巧言令色、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，而此三者具备，固可谓文明之成就，但也却正是“求荣取辱”、“政怠宦成”的开端，是“人亡政息”——即国家危亡的征兆，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。

## &lt;&lt;天下&gt;&gt;

作为“戎狄”的秦，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，都六合之上游，最终统摄四海，扫荡群雄，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、务实使然，秦人正是以朴素的“又战斗来又生产”、以南泥湾开荒般的“农战”精神，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。

秦的改革蓝图，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，这种自我批评，最终演化成“西戎”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“武器的批判”。

秦王扫六合，乃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、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。

《荀子·疆国》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：应侯(范雎)问孙卿子曰：入秦何见？

孙卿子曰：其固塞险，形势便，山林谷川秀，天才之利多，是形胜也。

入境，观其风俗，其百姓朴，其声乐不流污，其服不佻，甚畏有司而顺，古之术也。

及都邑官府，其百吏肃然，莫不恭俭、敦敬、忠信不桡，古之吏也。

入其国，观其士大夫，出于其门，入于公门，归其家，无有私事也；不周比，不朋党，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，古之士大夫也。

观其朝廷，其朝间，听决百事不留，恬然如无治者，古之朝也。

故四世有胜，非幸也，数也。

文中所谓“四世”者，是指秦献公以来百年，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推行新政的时代。

荀子所观察到的，恰是百年之后，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，这个新文明，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。

汉有天下，矫秦之枉，武帝弃“农战”而重“商战”，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，然而，不幸亦接踵而至：皇帝家产愈大、宫廷愈富，外戚、宦官的力量则愈强，如此一来，国家势必要以宫廷为中心，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藪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，汉文明重新陷入“文明与腐败循环”的辩证法，不可抑止地走向“自己反对自己”的文明异化——这却是历史的必然。

汉废秦法，剖海内而立宗子，郡守之下，又实行自治。

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，而“地方自治”的实质，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。

故终其两汉，中央“贵族”与地方“豪族”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，就在于“土地私有制”的恶性发展。

故柳宗元《封建论》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：“封建者，必私其土，子其人”，“非公之大也，私其力于己也，私其卫于子孙也。”

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为制，公之大也。

”这就是说：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，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；相反，秦的土地国有制，则是天下之大公。

汉代以来，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，也便是土地问题。

贵族、豪族圈占土地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，于是，谁掌握了失地流民，谁就能够实现霸业、掌握政权，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，便是汉末的豪族曹操。

西晋贵族，可谓将中原文明“只说不练”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，此即所谓“清谈”。

因此，将西晋的灭亡，归之于所谓“五胡乱华”，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：自晋惠帝以来，司马氏王族，同胞兄弟凡二十五人，自相残杀的结果，仅剩下了三人，西晋二世而亡，不闻延祚，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，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，为了争夺“私有产权”，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，这便是典型的“求荣取辱”、文明异化之惨剧；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，只不过是胡人奴隶，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：“大丈夫行事，当光明磊落，如日月之皎然。

不应如曹操、司马懿父子，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”。

君子爱才，取之有道，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“小胡”石勒，而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。

“天子失政，道在四夷”这句话，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。

汉代的乱源，便是贵族和豪族，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，便是一个“官产学一体化”的强大利益集团，而其中的“产”——即大土地庄园，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，因此

，救天下苍生于水火、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，便是实行“土地改革”。

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，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，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，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。

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，此法的核心，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，它一方面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，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，不分贫富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，正是这项法令，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。

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，固然是贵族和豪族，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，同样是贵族和豪族，他们尔虞我诈、骄奢淫佚——自己打败了自己，而这就叫做“文明异化”的道理。

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，使唐代制度的基础，得以重新建立在“农战”——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，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，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，北国的制度显然更为平民化，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，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、健全，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，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，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。

宋代建国，始终面临着辽、金、西夏的强大压力，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们，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、享乐、滥情痛加反省，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，以王安石、叶适为最深刻。

王安石曾指出：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，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，实则比夷狄尤甚，夷狄不过迷信鬼神，而中原则迷信文词，正是这种对于文饰、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，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，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，妙手文章，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——这与其说是文明，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。

于是，他创办学校，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，以观其才德，并于校内建立操场，供学生练习骑射。

又制订保甲、保马之法，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，先以自卫，终以服役官府，以期逐步恢复唐的“府兵”、秦的“农战”。

但是，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，宋更是历史上商品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，王安石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说：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，使他认识到“举国奢靡，全民腐败”的现实，这样的社会，这样的文明，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，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，叹息“变成法易，变世风难”，这就是因为在“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”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，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的问题：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，而且还需再造文明。

而王安石的命运，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：“其道大毅，使人忧，使人悲，其行难为也——虽独任，奈天下何！”

中原文明令人向往，但也使人堕落，正是对这种文明/野蛮辩证法的洞悉，正是对“文明异化”的自觉，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“南面”和“北面”两种制度，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，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，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，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的腐败，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，而这里的深意，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。

明代的思想家，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，看到了对文明的迷信，于人心诱惑之甚，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，尤其集中于对言辞、文饰的迷信这一点上，口诵莲花的士大夫，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、甚至没有文字的夷狄。

文饰是虚伪的渊藪，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。

而华夏文明的悲剧，正可概括为“只说不练”、眼高手低的悲剧。

张居正《陈六事疏》，其首在“省议论”，其次在“核名实”；王阳明《传习录》：“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，圣学只一个功夫，知行不可分作两事，”——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：陷入束缚人的斗争意志、行动意志的所谓“文明”，等于堕入“温水煮青蛙”的惨境，而那正是一种天大的愚昧。

王朝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夷狄政治家，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，他深刻地指出：“打天下”固然是残酷的斗争，而“坐天下”则是更为残酷、更为艰苦、更为持久的斗争，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业，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。

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，康熙皇帝这样感慨道：古帝王享年不永，书生每致讥评。

不知天下事烦，不胜其劳虑也。

## &lt;&lt;天下&gt;&gt;

人臣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，年老致仕而归，犹得抱子弄孙，优游自适。

帝王仔户无可旁委，舜歿苍梧，禹殂会稽，不遑宁处，终鲜止息。

洪范五福，终于考终命，以寿考之难得也。

易遁六爻，不及君主，人君无退藏之地也。

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！

康熙是伟大的政治家，更因为他懂得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，甚至就是武力，政治说穿了，便是如何正确、合法地使用武力。

可惜，在他的身后不久，八旗精兵却不可遏制地退化了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武力所击溃，而这就再一次、然而却并非最后一次说明：古老而灿烂的华夏文明，她的长处是“文治”，而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，它的政治神经却不够发达。

因为所谓政治，最终也就是武力，也就是专政，而文明的中国人却经常忘怀“愚蠢的夷狄”也明白的那个简单道理——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

近代以来，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宰制中国，又是由于它所发明的资本—金融体制，正是这个发明决定了：即使列强人口稀少、万般匮乏，但唯有“钱”和资本这一条，他们从来就是“天然过剩”的，而对于华夏文明中最短视的那一部分人来说，“过好日子”乃人生唯一追求，而钱之幻象便是过好日子的唯一基础，而他们对所谓“西方文明”之向往，无非就是对于钱的向往而已。

但是，他们又总是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：所谓招商引资，无非等于给自己招来个债主，因为犹太人的钱，那从来就不是好拿的。

丢掉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底线抵押给了别人，使人可“不战而分吾国，定约而制中华”。

戊戌变法之际，严复在《上皇帝万言书中》曾这样感慨说：国之富强，民之智勇，臣愚不知忌讳，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，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。

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，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。

故中国今日之大患，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，而阴相约，以不战而分吾国。

使其约既定，虽有圣者，不能为陛下谋也。

宝爱和平，珍惜生命，享受生活，热衷消费，这是文明之花繁盛的基础；但是，这也就是武将畏死、文臣贪财、见利忘义、醉生梦死、举国腐败的渊藪，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，是文明异化的残酷逻辑：因为胜利，党内的骄傲情绪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，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，可能生长。

因为胜利，人民感谢我们，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。

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，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。

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。

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

而所谓“艰苦奋斗”，无非是说：“文明”绝非表面的文饰，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，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，伟大的文明，就是埋藏在行动中的朴素精神。

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，这是血的教训，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，是撬动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杠杆。

而现代科学的精神的实质，也就是批判。

一人、一家、一社团、一国家，在其生存的道路上，欲求得不断之进步，那就需不断自省，就必须一面自省，一面批判，如此方才能不断地进步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上，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生存，往往是通过对照夷狄，进行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达到的，历史上的夷狄，便是中原文明的镜子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，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，没有夷狄，不成天下。

而近代以来，我们更有了科学这面镜子，发扬科学的精神，就是坚持批判的精神，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，首先就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日常化。

本书各篇，虽游历所记，实忧患之作也。

<<天下>>

比年疆忿日炽，海警再起，书生报国，唯有笔墨；念我列祖列宗，创业艰难，不考终寿；励我后辈子孙，行己有耻，居安思危，发愤图强。

尚定学长不弃浅陋，尝以“勿悔少作”加勉，承其美意，重将原稿粗加删减，成此新编，再供读者诸君批判。

原书初版之前，仰仗李二民兄所主持之《书城》杂志逐期刊载，再版之际，又赖郑闯琦兄奔走于寒风之间，校订于继晷之时；二兄笃行朴素之志，诲我尤深。

追怀先贤创业之艰辛，深感后来者之幸运，我感谢造化中存在的一切机缘，感谢所有的友人与敌人。

谨以圣王先贤之教诲，与尊敬的读者诸君相勉：闭门求学，其学无用；若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，则汗漫九垓，遍游四宇尚已。

河出潼关，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；风回三峡，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。

世界上一切事业及文明，固无不起于抵抗而决胜也。

韩毓海，2010年12月12日，于北京。

## 内容概要

以史为师，重溯中国崛起道路。

揭示历代由富裕引发奢靡衰败的历史怪圈。

寻找秦、唐、辽、清等走向强盛的内在规律。

为什么宋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“举国奢靡，全民腐败”？

王安石为什么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？

东北的振兴，为何关乎天下兴亡？

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，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 
为什么说李鸿章等“捐西守东”、“重南轻北”的战略，造成了清朝的崩溃  
“延安道路”为何像“关陇府兵制度”一样，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？

《天下：包纳四夷的中国》揭示了包纳“内陆”、“边疆”和“四夷番邦”的“天下中国观”，  
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：以诸夏辅京师，以四夷辅诸夏。  
作者以慷慨苍劲的笔触，从多民族视角，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，对祖国统一、多民族融合、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贡献，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。



## 作者简介

韩毓海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获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、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、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。

著作《五百年来谁著史——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》荣获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，《天下·香巴拉的中国》一篇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。

担任编剧的电视剧《星火》、《毛岸英》均创中央电视台年度最高收视率。

<<天下>>

书籍目录

修订版自序

海国图志

重新开眼看日本

曼哈顿的秘密

无穷花开鸟致院

北国风光

卢舍那

自远方

西北旺

日出西天

大雨落幽燕

亚细亚的心脏

这美丽的香格里拉

香巴拉的中国

消逝的冰川

风雨下江南

几度风雨海上花

叹江南

白银之死

原版

## 章节摘录

重新开眼看日本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、反省其历史之阴暗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——特别是其中哪些是“阴暗面”不甚了了。

于是，日本的“不反省历史”与我们的“不了解日本历史”相遇，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，而这种死结，只有通过对于日本社会“内在矛盾之研究”才能逐步打开。

明治维新在“现代化”和“富强”的意义上，长期被美化了，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出来，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。

这绝不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美化自己的历史，而是说在所谓“现代化意识形态”主导下，整个19世纪以来的残暴历史几乎没有被反思过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，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“精英”的中国人。

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竟是有形的专制，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无形的、精神和法统的专制，中国的皇帝称“天子”，皇帝的上面毕竟还有“天”，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，但是，日本的天皇竟然自称“天”，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。

历代的幕府将军虽然将天皇虚位，但却没有取代天皇，原因就是如此。

中国的革命可以打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，但是，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“天”，所以与中国相比，“革命”和改革，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合法性——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，日本当然有比中国更强烈的专制传统。

近代以来，日本出于种种目的，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，日积月累，逐渐深入透彻——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首推郭沫若，而郭沫若对于甲骨文、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，主要竟是在日本作出的，对日本“京都史学派”的巨大学术成就，郭沫若是肯定的。

与郭沫若并肩的历史学家是陈寅恪，所谓“群趋东邻受国史，神州士子羞欲死”，陈先生对国人之于自己历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这一点，认识更是很痛切的。

古人常说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，而近代以来，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，恰恰就是由于对日本准备、估计不足，研究了解不够所致。

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，宫崎市定曾这样说：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，总之，即是所谓“愚蠢莫过于轻敌”这种态度。

其后明朝灭亡、中国被另一个民族满洲征服时，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过抵抗，但大体上，抵抗是无力的，其中有种种原因，而在根本上是充满了这样的想法：对手不过是极为愚昧落后的夷狄罢了。

最近，当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之际，最初中国所采取的态度，当然也是把日本当成了大傻瓜。

历史证明：那些将日本当成了“小日本”、“大傻瓜”的人，所有的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罢了，如此下去，中国也只好继续吃亏。

因此，重新认识日本，重新开眼看日本，或者说大一点——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，乃是当务之急。

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、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其实对日本的历史——特别是其中哪些是“阴暗面”也不甚了了。

于是，日本的“不反省历史”与我们的“不了解日本历史”相遇，从而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，而这种死结，也只有通过中国对于日本社会“内在矛盾之研究”才能逐步打开。

而这些所谓“日本内部研究”的课题包括：从日本历史上看，它内部的基本矛盾何在？

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统？

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？

这些矛盾的走向、可能性后果怎样？

——我认为只有这种深入的研究，才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。

而所谓从日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，建立“中国的日本观”，这里的基本方法，说句某些人也许不爱听的——还是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说得最为明了。

他这样说：“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内部、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，即把事物的发展，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，而每一事物的

运动，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。

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，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，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。

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，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：一，从历史上看，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、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，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；二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，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，即对外侵略，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、促发的；三，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，“内因”才是变化的基础，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，而中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，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——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：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，则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

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。

一、从奈良到京都：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，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，这500余年，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。

P3-5

编辑推荐

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     《五百年来谁著史》作者新著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